



第26届上海电视节佳片推荐

英德合拍剧《温德米尔儿童》

一张整洁的床铺,于他们已是天堂

陆纾文

为了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5周年,BBC在今年年初推出了英德合拍讲述二战往事的短剧《温德米尔儿童》。在本届上海电视节上,该剧与同样讲述二战的英剧《战火浮生》一同登陆荧屏,与观众见面。



▲《温德米尔儿童》讲述的是二战后,遭遇大屠杀创伤的孩子在温德米尔湖畔终获救赎的故事

《温德米尔儿童》讲述的是二战后,遭遇大屠杀创伤的孩子被英国政府接纳,在温德米尔湖畔终获救赎的故事。在亲情缺失的情况下,他们从彼此身上找到家庭的温暖,与庄园里其他孩子一样适应战后的和平生活,等待失联的亲人。在温德米尔建立的友谊,也成为他们日后通往多彩未来的生命线。

1945年8月,二战即将结束。包括阿莱克·赫什科维兹在内的300名犹太儿童乘坐十架空军货机,从布拉格前往英格兰西北部的罗斯比-艾登皇家空军基地,之后抵达位于温德米尔湖畔的卡尔加斯庄园。这些孩子是英国政府“卡尔加斯儿童康复计划”的首批接收对象。在《温德米尔儿童》中,编剧西蒙·布洛克和导演迈克尔·塞缪尔没有花费过多的笔墨交代这些背景,而是在该剧的开头通过一组画外音,回忆孩子们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

当镜头切换到孩子们乘坐汽车抵达卡尔加斯庄园的情景时,昏暗的夜色宛如在战争中受伤的心,看不到光明。男孩警惕地提醒身边的同伴“放松会让你丧命”,也有乐观者回应:“嘿,放轻松,这里是英国。”他们的宿舍被安排在战时机场工人的临时住所,这些营房与死亡集中营颇有几分相似,但一张整洁的床铺,于他们已是天堂。

经历过战争、死亡甚至大屠杀创伤的孩子,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如何尝试着去想象他们在思考什么?这是当年摆在温德米尔的心理医师和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难题,也是如今《温德米尔儿童》的幕后团队所面对的难题。“你的第一反应是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进入他们的大脑,但很快就证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编剧西蒙·布洛克说,“我无法想象阿莱克·赫什科维兹几年来在包括奥斯威辛在内的四个集中营所经历的一切。我能做的,只有去思考当他们抵达温德米尔时,曾经的创伤会通过怎样的行为表现出来。”

于是,我们看到这些孩子被问及名字时下意识地卷起袖子,露出纳粹文在他们手臂上的编号;看到他们一哄而上抢夺面包,藏匿到任何一个视线所及的犄角旮旯;看到心理医师玛丽·帕内斯鼓励他们绘画时,纸上呈现的令人窒息的尸体和铁丝网……战争带来的伤痛太深,纳粹虽被打败,但他们的记忆依旧停留在集中营充满杀戮和死亡的夜晚。

初到卡尔加斯庄园,孩子们没有被安排任何心理咨询。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被鼓励去接触自然,在湖里游泳,到街头散步,并完成基础的英语课程。“很明显,只有当人们愿意接受心理治疗时,它才会产生作用。”布洛克说,“最重要的是先让他们生活在一起,只有面对同自己经历相同的人,人们才愿意吐露心声。”

在开始剧本创作时,布洛克采访了十多名曾接受“儿童康复计划”的集中营幸存者。与《美丽人生》等相同题材的影视作品相比,《温德米尔儿童》最出彩之处莫过于由真人真事改编,让观众在平实的叙述中萌发对生命的共鸣。剧中的孩子全由名不见经传的波兰年轻演员扮演,导演没有为那些在卡尔加斯工作的志愿者营造救世主的形象,而是在平复克制的叙事中展现儿童的细微变化。孩子们仿佛在不经意间实现了心灵的救赎,当他们逐渐走上康复之路时,温德米尔湖畔的美景也在镜头前缓缓铺开。

如果一定要在该剧中寻找一些着意刻画的东西,那便是对亲人的思念。《温德米尔儿童》里有一个极具感染力的镜头:当所有人都认为萨利克·法力诺瓦的兄弟早已在战争中身亡时,在一片绿茵场上,在没有任何征兆的足球友谊赛中,身穿军人制服的哥哥骑着摩托,突然闯入了所有人的视野。失散多年的兄弟奇迹般地重逢,镜头在众人身上划过,他们落寞的神情,与萨利克的喜悦而泣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温德米尔的绝大多数孩子来说,对亲人的等待只能换来绝望。当红十字会的汽车终于抵达时,屏幕上出现了一段令人窒息的沉默——一整箱牛皮信封,宣告了亲人已经遇难的结局。

四个月后,随着康复计划进入尾声,孩子们也将告别温德米尔,开启新的人生。在他们即将离开时,管理员奥斯卡·

弗里曼曼给了孩子们这样一段忠告:“当你们在战争中失去所有,世界向你们打开了善意的大门。但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曾经经历的痛苦,而对这个世界予取予求。愿你们都能在自己的领域赢得一席之地,即使被心中最黑暗的想法困扰,仍要对生活的奇迹心怀希望。”

毋庸置疑,他们做到了。该剧最后,故事戛然而止,波兰演员在湖中的倒影被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幸存者取代。他们还活着,谈论着家庭和世界带来的美好——本·赫夫戈特,他的父母都被纳粹枪杀,是温德米尔的时光让他不再孤独,作为一名举重运动员走上奥运赛场;阿莱克·赫什科维兹,教育工作者,亦是慈善组织“生活的行军”成员,每年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比克瑙集中营旧址之间组织徒步,在2009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

《温德米尔儿童》是一个从难以想象的创伤中终获救赎的故事,是一段关于接纳和爱的讲述,也是一种对战争和现世的思考。在同幸存者的对话中,布洛克认识到感恩和回馈是这个世界上最永恒的主题:“温德米尔的孩子是我遇见过的最懂得爱的人。他们发自内心地感恩新生,并且尽可能将爱回馈给这个世界。”在该剧开始拍摄的时候,加莱的难民营正经历伤痛。“我们希望这部影片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接纳那些逃离可怖经历的人并非难以实现。如果我们接纳并帮助他们,终有一天,他们会像温德米尔儿童一样,回馈这个世界。”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比克瑙集中营旧址之间组织徒步,在2009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

《温德米尔儿童》是一个从难以想象的创伤中终获救赎的故事,是一段关于接纳和爱的讲述,也是一种对战争和现世的思考。在同幸存者的对话中,布洛克认识到感恩和回馈是这个世界上最永恒的主题:“温德米尔的孩子是我遇见过的最懂得爱的人。他们发自内心地感恩新生,并且尽可能将爱回馈给这个世界。”在该剧开始拍摄的时候,加莱的难民营正经历伤痛。“我们希望这部影片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接纳那些逃离可怖经历的人并非难以实现。如果我们接纳并帮助他们,终有一天,他们会像温德米尔儿童一样,回馈这个世界。”

德国电视剧《奥蒂莉·冯·辉柏嘉》

她离开豪门家族,重启了自己的人生

薛晋文 刘子琪

本届上海电视节展播的德国电视单本剧《奥蒂莉·冯·辉柏嘉》,讲述了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德国女性的感人故事。这部脱胎于全球知名铅笔制造公司继承人真实经历的人生传奇令人动容,充满了社会分化变迁中的性别、权力对峙,并对女性试图征服世界和解放自我的艰辛旅程进行了细腻诠释,留下了女性“撼山易撼动既有伦理秩序难”的历史困惑。

前有《致命女人》引爆网络,后有《夫妻的世界》爽透人心,现有《三十而已》热度不减,在全球这一片“她叙事”的图景中,《奥蒂莉·冯·辉柏嘉》贡献了一块来自德国的独特的拼图。

一个故事:女性自主追寻人生的别样可能

奥蒂莉·冯·辉柏嘉的生命轨迹定格在动乱不堪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父亲早逝,这使得爷爷把产业交给男性继承人的愿望落空。洛萨·冯·法伯一手把A.W.Faber公司打造成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企业,眼看自己19岁的长孙女注定要成为家产继承人,老爷爷去世之前立下遗嘱:首先奥蒂莉必须与贵族结婚,其次“法伯”的姓氏在奥蒂莉婚后也必须保留。因此,当奥蒂莉于1898年与亚历山大结婚后,两人将各自姓氏法伯(Faber)和卡斯特尔(Castell)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新的家族姓氏“辉柏嘉”(Faber-Castell)。

这场婚姻让彼时仍然健在的洛萨遗孀非常高兴,这不仅因为亚历山大出身于德国最古老的贵族家庭,更因为老夫人在他身上看到了管理企业的能力,以及与整个家族一起肩并肩的热情——这一点尤为重要,“就像我的儿子那样”。因此,她亲自指定亚历山大为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我们不能说这对年轻的夫妇之间没有感情,但商业一定是这场婚姻中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庞大的产业和家人的期盼,沉甸甸的家族责任与不谙世事的少女人生形成了强烈对比,奥蒂莉的人

生注定不再完全属于自己,注定不会走寻常路。自由、幸福和梦想被家族使命强制挤占,对于独立的个体而言,奥蒂莉的自我需求,已然成为过于奢侈的一种存在。

1903年,26岁的奥蒂莉正式继承了公司,丈夫亚历山大则继续保留自己在企业中的身份。

婚后几年,亚历山大证明自己的确是非常合格甚至出色的丈夫/合伙人。在他的管理下,公司业务简直可以用“蒸蒸日上”来形容。到1911年的时候,公司的技术和金融部门共有2000名工人,200名办公室职员,在全世界拥有10万名固定客户。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亚历山大不得不扩大他的生产基地和生产规模。

在此期间,两人还一连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而最小的罗兰后来成为了公司继承人。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我们现在知道,战争对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旧有文明被摧毁,人们的生活、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取向被改变,而在当时,对于辉柏嘉而言,战争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公司设在德国境外的分公司和生产基地纷纷关闭,亚历山大去往日时谋求



▲《奥蒂莉·冯·辉柏嘉》讲述了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德国女性的故事

新的出路,长时间的两地分居让夫妻俩在精神上也越来越远,直到不再有共同语言。奥蒂莉爱上了一个名叫菲利普·冯·兰德的人:“亲爱的亚历山大,今天我向你提出一个请求:给我自由。”

亚历山大于1918年决定放手,奥蒂莉在离婚后嫁给了菲利普。她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将名下的家族基金移交到了彼时只有13岁的儿子罗兰名下,公司则由亚历山大全权所有,并在亚历山大于1928年去世之后移交给了罗兰。1944年,奥蒂莉去世。

一种觉醒:将情感的自信和独立还给女性

这样一个人生故事,其中留白为后人的叙述与想象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从“他者”中脱离和逃离,是现代中外影视剧创作所集中讨论的一个命题。

这里的“他者”多种多样,比如“妻子”“母亲”这样的身份对女性而言,就是一种“他者”。很多时候,当女性成为了“妻子”和“母亲”,就会遭受更加明显的性别偏见。《致命女人》中视家庭主妇为梦想的贝斯,从小被“洗脑”,从未有过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三十而已》中个人能力、业务能力极其强大的顾佳,也没有逃脱生育过后回归家庭的无奈。充满偏见的社会观念,将“母亲”角色之于家庭、子女的血缘、情感和任务捆绑在一起,女性成为无限付出和牺牲的代名词,常常沦为男性茶余饭后低俗取笑的谈资。

倘若与妻子、母亲等身份的“他者”进行脱离,必须以另一种身份的重新定位为参照系,比如职场。职场是两性身份和社会地位再造的主战场,也是社会关系、

社会认同的绝佳场所,更是女性不愿意与世界脱节的中间地带和桥头堡。

但职场的风浪更大,尤其是在奥蒂莉生活的那个年代。职场带给女性的不仅是社会身份的重拾,个性、理想等人文需求的觉醒,更象征着对男权主导社会的应战和进攻。当奥蒂莉从祖辈手中接下了庞大的家族企业,她的幸福荣辱就此与事业画上了等号,《奥蒂莉·冯·辉柏嘉》的创作者将一百年前德国社会强大的男性世界的禁锢、压迫,投射到奥蒂莉艰难经营企业中,体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获得尊重、赢得地位的困境。

当代影视创作聚焦的另一个话题,是将情感的自信和独立还给女性。

在言情剧中,我们总能看到这些戏剧性场景:女性被世人赋予了太多的美好寄托,她们在少女阶段应该是善良、美好、温柔的天使,成为妻子后是宽厚、隐忍、坚强、牺牲的伟大女性。《奥蒂莉·冯·辉柏嘉》也面临着这样的创作陷阱,即将爱情禁锢在理智中,含蓄展现奥蒂莉置于内心隐秘角落的人性本质。所幸我们看到,经过自我诉求和社会伦理秩序的痛苦挣扎,她内心迸发的自由愿景终于战胜了“无爱婚姻”,奥蒂莉做出了人生的大胆选择,不再受到责任、伦理和社会秩序的束缚,转而大胆地通过离婚来迎接新生。一声“给我自由”,解放了自己的身份枷锁,最终将无爱的待机状态觉醒升华为生命

的重启状态。人的情感本能和情感自由越能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理解,人类社会就越能向着文明再前进一步——这种觉醒,让该剧真正具有了现代性,既呼应着文艺复兴浪潮中对“人”的重新认识,更是以爱之名给予女性灵魂的深情人道主义关怀。

(作者分别为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讲师)

